

# 第一章 美洲各殖民地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形成原因

## 一、孕育美洲各殖民地的不同“母体”： 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

我们要研究近代美国与拉丁美洲国家发展模式的差异性，那就应该回溯到它们在殖民地时期各自所形成的不同的经济和政治结构。由此 我们又有必要探讨孕育这些殖民地的“母体”英国、西班牙、葡萄牙在近代初期的历史特点，因为它们自身的某些社会经济特点必然会像基因一样遗传给各自的殖民地。这正如美国学者所指出的，如要比较研究独立后美国和拉丁美洲国家发展模式的基础，不可避免地要追溯到它们的“母体”—— 欧洲不同的文化复合体，“因为英国和伊比利亚的殖民者是由此迁移出来的，并在这个复合体内孕育出他们的社会模式。比较地方参与殖民地政治进程的程度、审查和宽容的程度、关于教育的见解、殖民地的经济自由的程度是不够的，而应该沿着这些成分的痕迹，直到其欧洲的母体中。……同西班牙人相反，北美的英国殖民者来自近代化的英国，在那里，一般来说 扫盲、宽容性、个人权利、经济自由、节俭和投资都被看作变革和发展进程中不可分割的因素”。<sup>①</sup>另一位美国学者也指出：“在殖民时期中，英国的资本主义有了不断的与迅速的发

展，冲破了该国的封建关系，产生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这在 1642 年到 1688 年的革命时期中更加尖锐地表现出来。”<sup>②</sup>秘鲁的现代著名理论家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也认为：“殖民化在美国留下了当时正在欧洲形成、而且代表着未来的一种精神和一种经济的萌芽；而殖民化给西班牙美洲带来的是正在衰退而且只代表过去的一种精神和一种经济的结果和方法。”<sup>③</sup>

显然，各欧洲‘母体’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必然会影响到相应的美洲殖民地的经济开发方式、政治管理制度、社会结构以及人们的精神状态。因此，了解近代前期欧洲殖民强国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不同历史特点，是我们探究近代美国与拉丁美洲发展模式差异性的出发点。

### 迈向近代化的英国

当代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曾将近代初期的英国与伊比利亚国家的经济发展特点作了以下的比较：“丹尼尔·笛福在 1726 年说道：‘英国的贸易造就绅士，并已经使这个国家充斥了绅士。’对西班牙贵族来说，这简直是十足的诅咒。这种观点在西班牙议会里反映出来，那就是与英国国会相反，重养羊业而轻工商业。而英国，在中世纪曾出口生羊毛，此时国会立法阻止生羊毛出口，而鼓励发展国内的毛纺织业。1500 年，伦敦出口 5 万匹毛布，及至 1550 年就增加到 13 万匹。在西班牙，势力强大的牧羊主组成的牧羊主团却取得了胜利，于是羊毛出口和毛布进口得到了鼓励。到了地理大发现时代，西班牙已成为北欧制成品包括纺织品、小五金的进口国，同时也是羊毛、酒类和铁矿石等原料的出口国。总之，半封建的西班牙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西北欧经济上的附庸。葡萄牙亦复如此，它进口小五金、纺织品、谷物和腌鱼，而出口的则是酒类、食盐和非洲的黄金。”<sup>④</sup>从这段引文我们可以看到，早在中世纪末期，

英国的社会经济已处在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下，其制造工业已得到推动；与此相反，由于当时的伊比利亚国家仍然处在中世纪封建精神的支配下，坚持原料出口，因此它们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要落后于英国等西北欧国家。

在中世纪后期逐渐成型的西欧各国中，英国从 16 世纪到 18 世纪在经济和政治结构方面经受了最剧烈的变革；特别是在 17 世纪，也就是在它创建和开发北美殖民地前期，其国内的政治革命与经济变革持续而快速地推动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到 17 世纪可以说，英国已闯入了现今我们所说的近代世界”。<sup>⑤</sup>在政治领域，1688 年“光荣革命”后英国确立了议会权力超过君主的立宪君主制和两党制度，由此开创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在经济领域，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全面发展，为工业革命的启动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上述的变革对其北美殖民地的政治经济结构的形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下面我们就概述一下上述时期英国政治经济变革的情况。首先到 16 世纪末和 17 世纪初英国的政治结构逐渐发生了变化。新生的资产者和从事资本主义经营的贵族，在经济上日益强大，他们对专制君主的横征暴敛，以及特权公司依仗君主垄断商业贸易等行为极为不满。这时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已受到沉重打击：一方面，借助 16 世纪中期的宗教改革，高级教士的特权已受到严重的削弱；另一方面，1588 年英国击溃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基本上消除了外部的威胁，所以资产阶级和部分贵族已不再迫切需要君主的保护。更有甚者，这些社会阶级同君主的矛盾冲突逐步激化。显然，君主专制制度已丧失了它的社会基础。因此，到 17 世纪初，英国的君主专制政体已濒临崩溃。

17 世纪的英国革命在经历了长期而曲折的进程后，到了 1688 年“光荣革命”便确立了一个明确的目标：限制王权，而提高议会权力，使后者成为英国政治生活中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机构。实际

上,从 17 世纪末到 18 世纪初,大商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已拥有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实力,他们借助自己所控制的议会,通过一系列立法来限制王权,并逐渐确立了国王“统而不治”、议会权力不断扩大的立宪君主制的政治体制。<sup>⑥</sup>

其次,与同一时期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等一些具有庞大官僚机构的专制君主国相比,英国的行政管理部门人员较少,经费有限。同时英国地方上的各个郡也没有像法国、西班牙等国那么多的军事机构和军队,各地社会秩序的维持和法律的执行都是由当地的乡绅担任的,这是英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点。

在立宪君主制确定的过程中,1701 年的《王位继承法》具有限制王权的重要作用。除了有关王位继承的规定之外,该法还规定,国王的任何决定须由作为枢密院成员的政府大臣签署才有效。它还确认法官的更换权属于议会;凡经议会定罪的人,国王都不能任意予以赦免。事实上,《王位继承法》通过立法的形式,确立了议会高于王权和司法权独立于王权的原则,同时从法律上防止国王独断专行。<sup>⑦</sup>

17 世纪英国政治领域中这些革命性的变革不仅为其国内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政治保证,而且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北美殖民地的政治构造,特别是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实践树立了榜样。

此外,16—18 世纪英国的经济领域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特别是农牧业较早地确立了商品经济运行机制,率先实现了资本主义化,为以后的工业革命的全面展开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上述时期英国的人口从 400 万增至 580 万<sup>⑧</sup>这一增长应部分归因于农业革命。首先是牧羊业迅速发展,农牧业实现商品化,这逐步推动了地主与租地农的土地关系体系的确立,这一体系“将土地的所有与土地的经营纳入了一种更能发挥生产者和经营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更有利于技术改革的近代资本主义体系”。<sup>⑨</sup>在此基础上出现

了粮食和饲料生产的新局面，新的农业生产技术不断涌现。农牧业经济的全面变革和发展不断对工业提出要求，并最终突破手工业的框架，而促使近代机器工业迅速地建立起来。

由于上述原因，英国很早就出现了手工业向机器工业的转变进程。其主要特点是：部门结构齐全，种类繁多，其中有轻重工业、消费资料工业和生产资料工业等；工业分布全国各地，且出现专业化倾向；工业区的形成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地区分工；除此之外，生产体制的多样性和过渡性、手工业各部门的生产组织形式的多样化，这一切形成了工业革命的前奏。生产体制的多样性预示了英国工业发展的趋势：企业规模趋于扩大，生产日益集中，设备日趋资本化。简而言之，工业部门不断地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因此英国必然会产生机器工业。

英国经济在实现近代化过程中的另一个特点是形成了完善的国内外市场体系。到18世纪前期，英国各地普遍形成了专门的市场城市。据统计，172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有市场城市758个，1741年增至786个，平均每个郡有16个。随着市场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市场的数量不断增加。在笛福时代，伦敦约有40个市场。<sup>⑩</sup>在市场城市形成的基础上，还逐步形成地区性贸易中心。这样，在工业革命启动之前，英国已逐步形成了全国性贸易中心、地区性贸易中心和地方市场城镇的三位一体的完善的国内市场体系。它将英国大部分地区纳入产销运动中，使不同经济区相互连接，并让商品在全国范围自由流通，这为以后机器工业的启动提供了必需的条件。

伴随着国内市场体系的形成，英国还逐步建立起日益广阔的海外市场。除了传统的欧洲大陆市场之外，还形成了加勒比、北美、西非和东亚市场。这些非传统市场作为英国的工业原料、生活资料和再出口商品的进口市场，英国制造工业产品的出口市场，其地位越来越为重要。例如，1752年到1754年美洲吸收了英国全部出口制

制造业产品的 25% 除呢绒之外 其他制造业产品出口的 50%。<sup>⑪</sup>到 18 世纪中期，英国已确立了它在海外市场上的优势地位，这又为它的工业生产扩展创造了另一个必要条件。

综上所述，16 世纪到 18 世纪是英国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型时期。随着资本主义持续快速的发展，专制主义政体趋于瓦解，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开始形成。与此同时，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观念也在不断更新，开始出现工业社会的三层结构：在上层贵族与下层民众之间，中产阶级开始成长和壮大，成为实现近代化的重要推动力。此外，“由于农牧业生产的商品化使地租与利润相结合，一些地主便开始改变过去单纯‘坐享其成’的观念，利用其地产上的资源追求利润和效率”。这样一来，社会逐渐形成了重商、务实、敢于冒险和进取的风尚。

显然，上述的近代前期英国社会经济的资本主义特点，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北美殖民地的独特性之形成，这正如福斯特所指出的：“至于英国，资本家阶级在一个发展的工业基础上，已经开始占取上风。这个事实在美洲殖民地以后发展中具有极大的意义，并且深刻地影响其工业发展、移民方式及其政治组织。”<sup>⑫</sup>

### 中世纪遗产沉重的西班牙

斯塔夫里亚诺斯认为：“到了 15 世纪末叶 在经济发展方面 伊比利亚半岛两大国已经落后于西北欧。在西班牙，由于哈布斯堡王朝进行了整整一个世纪的王朝战争和宗教战争，浪费了人力物力，搞得民穷财尽。此外，古老的封建体制和轻视体力劳动与工商业经营的价值观念，也使得西班牙裹足不前。”<sup>⑬</sup>然而，到 16 世纪前期，两大基本因素使得西班牙天主教国王的君主国跃居世界政治中的首要地位：其一，查理五世本人将西班牙、哈布斯堡和勃艮第的继承权集于一身；其二，辽阔的美洲领土变为西班牙王室的殖民地。因此，

在西班牙复合体中居领导地位的王国——卡斯蒂利亚（为西班牙文 Castilla 的音译，旧译“卡斯提尔”）一下子从一个国家或半岛范围升为全球范围的国家，它以全球霸主的角色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但是到了 1700 年，由于政治危机和经济衰弱交织在一起，西班牙的“伟大”成了一种虚幻的表象。

17 世纪末，半岛上的西班牙人口比同一世纪初少了 100 万，而在 1715 年西班牙人口接近于 1514 年的水平：750 万人。<sup>④</sup>其人口减少存在着多种自然和人为的因素：如同欧洲其余部分一样，它的部分地区遭受传染病和自然灾害的影响；美洲殖民地的征服和开发吸收了比官方登记人数还要多的西班牙人，在欧洲其他地区的驻军吸收了大批青年；此外，驱逐犹太人和摩尔人，以及新教教徒和稍后大批摩尔人的逃亡，这些都造成了人口的大量流失。16 世纪到 17 世纪末，西班牙人口的下降反映了君主专制政治制度和经济衰退的一个侧面。

实际上，近代前期欧洲人思想所接受的最大神话，就是西班牙本身这个神话。15 世纪末，西班牙才开始巩固它的政治地理和作为民族国家的内部结构。费尔南多和伊莎贝尔的联姻，经常被视为现代西班牙国家的诞生，但这不是阿拉贡和卡斯蒂利亚两王国统一的结果，而是两人共同统治。实际上，“西班牙王国”的两部分作为两个独立的实体并存，因为它们有着不同的法律、征税制度、硬币铸造和贸易规则。此外，每个王国又增添了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成分。这种“统一”模式在中世纪末的欧洲很普遍，而它在西班牙一直持续到近代前期，这就使得西班牙成为西欧政治发展中的落伍者。

由此看来，西班牙统一的基础十分薄弱，在这个统一体中仅卡斯蒂利亚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它对整个国家的贡献不大。正如西班牙历史学家所指出的：“卡斯蒂利亚构成半岛的政治和文化的主导细胞，但是，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活动并没有把西班牙其余王国聚集

在一起，它缺少全面的贡献，也没有为了共同理想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卡斯蒂利亚承担了宏大的责任来推动帝国的战车前进，但是它得到了补偿：在全国居首要地位，并开发美洲帝国”。<sup>④</sup>实际上，在对待美洲开发的问题上，卡斯蒂利亚排斥了西班牙其余地区，而以中世纪方式实行独占：在美洲实行封地契约形式，或者说，在哥伦布作为伊莎贝尔女王个人代理人而航海的前提下，实行个人占有。结果，阿拉贡王国及其附属地那不勒斯、西西里、马略卡岛在法律上被排除出直接参与开发美洲殖民地。伊比利亚半岛的第三个政治区域——巴斯克各省只是通过联盟形式而加入卡斯蒂利亚王国，而按巴斯克人的说法，这一联盟取决于对其地方特权的承认，包括不接受卡斯蒂利亚征税和征兵，保持一条海关边界：给予“免税各省”同西班牙贸易时“外国的地位”。这样，巴斯克人没有直接同美洲接触。因此，有人将西班牙称作“几个西班牙”(las Españas)。

近代前期的西班牙的另一个特点是政治与宗教相互交织，社会中充斥着强烈的基督教精神；其国王以天主教会正统的卫道士的身份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由此使西班牙深深地卷入欧洲的政治、宗教和军事斗争的漩涡之中，最终耗尽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正是在中世纪宗教精神的鼓舞下，西班牙极力推动美洲殖民地的天主教化，竭尽全力反对宗教改革，担当起维护天主教会正统的任务，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它的理想：建立一个全球性君主国——天主教统一体的翻版。

16世纪的西班牙虽然握有世界政治霸权，但是如果剥开它的霸主的外衣，就可以发现其强大的虚幻性，正如一位西班牙学者所分析的：“我们掩蔽一切的霸权，并不是建立在繁荣的民族经济之上；我们没有利用这种霸权来推动生产活动，而是逐渐衰败下来，其中理由之一是因为所获得的财富都被抵押了出去，当时运抵塞维利亚的财富，都按照来自安特卫普、奥格斯堡或热那亚的皇帝及其债

权人的要求 急忙运出。”另一位学者也揭示了那时的经济现实：“具有过大的目标、对国家可能性的夸大估计、对经济事务的全面贬低和在这个领域的重大错误的政策，最终反过来对付追随这一政策的伟大、有魄力和强大的人民。要是没有一项适宜的经济政策，没有无畏、永不枯竭和坚持劳动的人民的持续贡献，就不会有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和帝国。只有一个唐吉珂德，是不可能保持一个辽阔的帝国的。”<sup>116</sup>

确实，近代前期西班牙经济十分落后，它并没有发生像英国那样重大的经济转变。1492年，西班牙实际上依附于西欧其他地区：主要出口酒、羊毛、铁矿砂和其他初级产品。16世纪前半期其本国生产有所增长，这主要是对美洲殖民地对食品、服装和包铁的需求作出的反应。但是，这种迅速增长，被半岛的制成品与西欧其余地区的制成品之间持续的巨大差价抵消了。1550年之后美洲白银巨大的汇集使得西班牙的价格结构膨胀，这比其欧洲贸易伙伴更快更深刻。在此过程中，1550年之前，为满足美洲殖民地的新需求而发展起来的少量工业企业遭受破产。在来自意大利北部、法国、荷兰和英国的更廉价的大量羊毛及丝织品的压力下，巴伦西亚、塞维利亚、托莱多、阿维拉、塞哥维亚和布尔戈斯的纺织工业企业纷纷破产。当1630年起美洲白银的流入量明显下降时，西班牙的民族工业企业已寥若晨星。

西班牙的农业同工业一样，也经历了在半岛和美洲殖民地不断增长的需求和价格的短暂刺激；与此同时，劳动力和投资从西班牙的中部转移到了南部沿海地区。16世纪后半期西班牙中部的小麦和酒的生产已满足不了需求；然而，沿海地区借助于小企业，增加了出口的油和酒的生产。埃斯特雷马杜拉和安达卢西亚的羊毛、酒和食油的大生产巨头的田庄扩大了生产面积，而卡斯蒂利亚的老农业区逐渐被废弃了。

由于国内制造业的萎缩，半岛南部边缘地区的出口农业的发展，以及阻碍国内贸易交流的自然和人为障碍的长期存在，同国外及美洲殖民地的贸易就变为半岛经济的磁石。1561年马德里建为京城，这为同法国、佛兰德斯和意大利进行奢侈品的有利可图的贸易提供了时机。17世纪末，所谓的马德里五大行会提供的进口奢侈品控制了首都的经济生活。然而，马德里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依赖美洲矿产品的“王家伍一税”的汇款，以及集中在塞维利亚的殖民地的海关收入和利润。

尽管西班牙王室垄断了美洲贸易，但是，实际上从一开始到18世纪外国人就一直参与殖民地的贸易，因为西班牙的大部分行会成员成为外商的代理人，为外国人的利益效劳。同时，外国船只运送大量商品到西班牙的港口。17世纪末，猖獗的走私活动、外商同海关人员的勾结，都是打破西班牙王室对贸易垄断的重要因素。

由此可见 尽管16世纪西班牙拥有美洲的巨大财富，但是它的民族经济并没有繁荣起来，它的农业和工业并没有走上近代化道路。有人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决定性因素是：“16世纪初低地国家、英国和法国对卡斯蒂利亚的工业优势；卡斯蒂利亚的价格水平偏离欧洲其他地区；卡斯蒂利亚缺少资本主义精神，和哈布斯堡家族对欧洲的干涉政策。”<sup>①</sup>简而言之，西班牙长期残存的中世纪封建制度和精神，是其经济落后的最根本的原因。

近代前期，当西班牙的工农业趋于衰退之时，其社会结构仍然保持着中世纪模式。其主要特点是，贵族、官僚和教士队伍不断扩大，而中产阶级人数趋于缩减。16世纪全国拥有特权者仅20个家族，即大公爵的数额，同时确立了贵族等级制。但是，王室一直需要现金，所以它不断向有支付能力的人出卖贵族头衔。获得贵族爵位者就可以免除捐税和免缴各种费用。因此，国内其他阶级承担了日益沉重的赋税。但是，卖官鬻爵在继续，并且不只是出卖中下等级

的头衔。

1520年查理五世规定了大公爵与有爵位者的礼遇。1525年，两者总共为63个家族，但是到了1581年增至100个。现在，我们从一个地区来看一下其社会结构状况。16世纪末加利西亚约有60万人口，不同等级的贵族约有5万人，相当于全地区人口的8.3%。教士占总人口的2%约1.2万人。城市资产者、海上劳动者（渔民、水兵、造船工）、军人和官吏总共约11万人，即占总人口的18.3%。其余约70%的人口（约40万人）为广大农民群众。但到17世纪时城市资产者和海上劳动者人数严重减少。<sup>⑩</sup>由此可见，西班牙的社会构成明显不同于正在走向资本主义的英国，前者的贵族和教士队伍过度膨胀，并且他们都过着寄生的生活，所以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在近代西班牙各地，教堂林立，享有特权的教士人数不断增加，影响巨大。据统计，16世纪末僧侣人数为169300人，而到17世纪初增至20万人。其中，仅方济各会教士和多明我会教士就达3.2万人。卡拉奥拉（Calahorra）和潘普洛纳（Pamplona）两个主教管区的教士多达2.4万人，仅塞维利亚主教管区就有1.4万名教士。据1626年统计，全国男修道院增至9088座。<sup>⑪</sup>在这种宗教氛围中，教士在国家政治中的影响举足轻重，“教士的突出身份占据了所有的缺口：从兼并西印度领土所提出的问题，到热忱捍卫对欧洲的国际政策，并为之辩护。从其整体看，16世纪的西班牙教士都是在查理五世和费利佩二世的政策影响下形成其理想的”。<sup>⑫</sup>此外，费利佩二世这一代人，为了坚守西班牙这座天主教的堡垒，避免其内部受到感染，甚至禁止年轻人去外国大学注册学习（1559年敕令，1568年加以重申），结果，西班牙王室的某些政策导向趋于创造一种狭隘的宗教民族主义。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广大下层社会阶级——农民、牧人、手工艺者、短工等的生活状况。16世纪期间，由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无产

者的人数增多。由于农业开发收益低下，小农生活极其艰难。这样，城市为小农和农村短工提供了一定的活动空间。他们在城市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一些人做小生意，另一些人沦为依靠教会、商人或贵族施舍的乞丐。据估计 16 世纪末西班牙的乞丐和流浪汉的人数约有 15 万人。<sup>②</sup>

在中世纪的社会氛围中，西班牙人仍然保持着从收复失地运动起就出现的对体力劳动职业的厌恶和对贵族生活方式的追求，显然，这种思想实际上阻碍了资本主义的成长。在深入研究了哈布斯堡王朝时代西班牙的特性后，一位西班牙公爵以如下语言描述了当时西班牙人的思想和心理：“由于纯洁的宗教和君主信仰，在英勇持续进取了百多年之后，因爱上帝、伊莎贝尔、费尔南多、查理或费利佩，逐步形成我们优等人民的思想和心理，他们蔑视卑贱的事务、有报酬的行业，以及资产阶级化、平凡的自由职业。他们认为，实际上几乎所有人都渴求、甚至贪求更多的物质财富，不应当通过耐心的劳动而得到特别的酬报，也不应当小里小气地赢得，更不是通过吝啬的分配取得，而应当是大胆冒险的应得奖赏、艰难征服的应得最好战利品，限定继承人的合法祖传财产，作为统治世系后代因田庄的永久所有权而获得的荣誉。”<sup>③</sup>由此看来，16 世纪的西班牙社会，特别是卡斯蒂利亚社会的道德塑造是以上帝选民、战胜者的傲慢和严厉为导向的，显然，这是以中世纪的宗教和骑士精神排斥了资本主义精神。

显而易见，1700 年之前的两个世纪中，作为欠发达地区的西班牙及其美洲殖民地，不可能以贵族的价值观和意愿来实现他们的经济近代化和改造传统的社会。实际上，从美洲殖民之初起，西班牙基本上是以中世纪精神和制度来组织经济活动和进行社会政治管理的。由于缺少一个民族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商业集团，所以西班牙不可能像 1500 年到 1700 年间荷兰、英国和法国所做的那样，充

分利用各种资源、劳动力和制度结构来开发海外殖民地，并使自身进入商业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阶段。

历史表明，近代前期的西班牙对于打破它的中世纪遗产尚未作好准备。数个世纪，在伊比利亚半岛的领土扩张，收复失地运动和反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斗争，长期突出了富有战斗性的贵族和天主教会的主导作用。1500年之前，这种中世纪遗产并没有构成西班牙扩张的障碍，相反，是一个团结西班牙民族的因素。美洲殖民地化、墨西哥和秘鲁的开发，使它无需对以土地和贵族为基础的西班牙半封建的社会经济进行改革。然而，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经济萎缩的过程，因为十分重要的农、工业生产部门收缩，相反作为消费者单位的贵族官僚机构、天主教会和某些服务业却萌发了新芽。这样，所出现的病理征兆，无论是在社会政治还是在经济方面，在美洲殖民地还是在伊比利亚半岛，都是显而易见的。1600年以后，当已迈向近代化的欧洲国家已经对贵族特权、君主专制制度、战斗性的教会、公共权力的私人用益权、以金银多寡作为衡量财富的准则提出挑战之时，这些中世纪原则反而在西班牙及其美洲殖民地得到加强。

### 依附于英国的葡萄牙

到1700年，如果说西班牙是欧洲病夫，那么葡萄牙则是被人遗忘的角落。实际上，此时葡萄牙已是英国的附庸。通过1703年的英葡《梅修因条约》，葡萄牙及其美洲殖民地——巴西的经济同英国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上述条约把葡萄牙和巴西带进了经济帝国主义网络中，其中心是英国。对于葡萄牙的这种依附地位，18世纪后期该国的庞巴尔侯爵坦陈：“英国人坚定地把我国当作一个附属国而使之联系在一起。他们没有利用粗暴的征服而征服了这个国家……英国已变为葡萄牙的全部贸易的主宰，并通过其代理人而进

行这个国家的贸易交流。’<sup>②</sup>

16 世纪葡萄牙人口约有 125 万，尽管其人口的绝对数字大大少于西班牙，但是其人口密度却超过后者。在一个多世纪期间，葡萄牙处于专制政体下，却拥有一个小而团结的资产阶级集团，其主要商业中心是里斯本。它在欧洲起着经济附庸的纽带作用：荷兰船只经里斯本把北欧的谷物、冶金产品、羊毛衣物和咸鱼汇集到葡萄牙，而从里斯本运出非洲的黄金和锡图巴尔的盐。

从 15 世纪起，葡萄牙人就探测了大西洋，西至亚速尔群岛，南至非洲西海岸和佛得角；经过 15 世纪末达·伽马环非洲航行最终找到了津巴布韦的莫诺马达帕金矿的直接入口处。他们通过创立一所航海学校，训练海员、收集有关非洲西海岸的情报，寻找一条畅通的海路以开发印度洋和东亚的贸易潜力，并进而改善航海技术。他们是绕过非洲大陆最南端的第一批欧洲人。葡萄牙人集中了有限的资金、劳动力和船只，以探测通过海路进入印度、马六甲海峡和中国南部。他们一旦成为印度洋的主人，就控制了辽阔海域的航线，包括日本和中国之间的运输，并从这种垄断中获利：先是香料贸易 后是奢侈品贸易 诸如丝绸和瓷器 以换取白银。

由于上述原因，16 世纪前期葡萄牙人把巴西的发现（1500 年）视为次要的问题。只是出于对巴西沿海贸易中竞争的担心，特别是为了阻止法国和英国在出口巴西木方面建立其沿海飞地，葡萄牙人才在 16 世纪后半期开始作出长期占领巴西的打算，并在美洲建立其种植园经济。

如果像西班牙那样在美洲大规模创建移民拓殖地，那么本国人口有限的葡萄牙在巴西是不可能推行建立类似的拓殖地的政策的。而在印度洋和亚洲沿海地区，葡萄牙人只是创建少量的贸易据点和搞运输活动。因此，葡萄牙人在海外的活动代表了由意大利航海中心加以完善的中世纪贸易模式的最后阶段。实际上，在东方的贸易

收入，并没有转而投资于巴西的种植园或巴西的货物运输上，甚至也没有投资到在葡萄牙创办炼糖厂上。到 16 世纪末，荷兰人控制了巴西和葡萄牙之间货运的 66%，掌握了从巴西出口到阿姆斯特丹（并非里斯本）的大部分蔗糖，拥有加工巴西粗糖的约 25 座炼糖厂（1621 年）<sup>②</sup>。

相对发达的航海技艺和它的优越的地理位置的结合，使得葡萄牙中世纪末期的（或前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扩展到巴西。建立在古老的商品贸易基础上的这种贸易模式，就是利用高价值的轻商品作为贸易的货物，他们只需一批大吨位的船只就能进行有利可图的大买卖。对于经济强国荷兰来说，动员一批人力、资金和船只，以尾随葡萄牙人直到他们的贸易起源地，而后驱逐他们，这些行动的实现只是时间问题。在 17 世纪前半期，荷兰人迫使葡萄牙人减少他们在亚洲外围的活动，并在 1630 年至 1654 年间夺占了巴西的累西腓，这样就控制了蔗糖贸易。虽然在 1654 年葡萄牙人夺回了累西腓，但是他们对巴西蔗糖的垄断已被在加勒比地区的荷兰和英国殖民地的种植园的发展所打破。

经过两个世纪的扩张，到 1700 年葡萄牙开始海外的收缩，现在只剩下它的虚幻的伟大。与此同时，贸易利润既没有反映到葡萄牙本土制造业的发展上，也没有反映到它的财政制度上，更没有反映在人口的增长上。实际上，已有高比例的移民首先迁往亚洲的贸易飞地，而后迁往巴西的农业地带。殖民地的收入只扩大了葡萄牙的服务部门。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软弱的葡萄牙不得不同英国结盟，在此条件下，它在法国对西班牙入侵的威胁下幸存了下来。

1703 年的《梅修因条约》迫使葡萄牙减少了对来自英国的毛织品的进口关税，后来这种减税又扩及法国与荷兰的毛织品。反之，英国给予葡萄牙的酒类以优惠待遇。实际上，这一条约“断送了一息尚存的葡萄牙工业，并且确保在巴西发现的金矿所开采的黄金 1/2

至 3/4 都要花在英国”。<sup>⑤</sup>1700 年 英国全部出口的近 11% 输往葡萄牙和巴西。葡萄牙，一个袖珍宗主国与一个巨大的美洲殖民地并存，显然，它无力提供殖民地所需的制成品，而如果没有巴西的产品，它更无力支付国家所需的进口产品。与西班牙一样，此时葡萄牙已是其美洲殖民地的依附物。换言之，通过葡萄牙早熟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巴西依附于西欧经济。然而，巴西已成为葡萄牙的经济核心。

综上所述 在 1500 年到 1700 年间，亦即美洲殖民地的政治经济结构趋于定型之时，孕育这些殖民地的“母体”发展为差别极大的文化复合体。英国经过激烈而曲折的斗争，逐步摆脱了封建体制，进而走上近代化道路，发展成为世界上首要的资本主义强国。显然，英国的这种近代化进程和特点，不可避免地给其北美殖民地的开发和经营打上了资本主义的印记。与此相对照，背负着沉重的中世纪遗产的伊比利亚国家，在所述的 200 年间并没有发生重大的政治经济变革，也没有使其内部结构近代化，并且它们自身在经济上长期依附于西欧强国。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西班牙和葡萄牙扩展到大西洋彼岸，在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的基础上创建了辽阔的美洲殖民地，这样给这些殖民地带来经济上的依附性、政治上的专制主义。总之，“是落后的母国将它们自己的落后性传给了它们的殖民地后代”。<sup>⑥</sup>

## 二、拉美与北美殖民地的经济与社会独特性之形成

16 世纪到 18 世纪初，也就是拉丁美洲与盎格鲁美洲殖民地的发展模式开始形成的时期，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主要在重商主义精神的支配下来塑造其殖民地经济结构。但是如前所述，由于各个“母体”的不同国情 美洲各殖民地不同的自然和社会条件 所以各

宗主国对美洲相应地区所采取的具体的经济开发和管理方式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其结果造成了富有个性的各个殖民地结构，这就是独立后美国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不同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之滥觞。

关于近代前期欧洲殖民强国在重商主义影响下开发和经营美洲殖民地的问题，福斯特作了以下的阐述，约从 1500 年到 1800 年，即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数世纪的殖民时期，欧洲的统治阶级“即以当时盛行于欧洲之混合的封建主义——重商主义制度为他们在新世界取得的广大领土的政策发展的基础。商业资本家集中力量发展并为本国建立商船队。他们设法发展‘出超的贸易’和在他们本国积聚最大可能数量的黄金”。<sup>②</sup>斯塔夫里亚诺斯也认为：“从 1400 年至 1770 年，是商业资本主义和重商主义时期——这一时期资本的大部分投入商业企业，商人们组织了股份公司并得到皇家的特许状，准予他们在一定的海外领地上享有贸易垄断权和殖民特权。由于在那几个世纪中，商业资本主义的技术力量和经济力量有限，殖民活动大部分限于南、北美洲……”<sup>③</sup>他又指出：“重商主义的目的是加强新的君主政体的统一和力量，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积累金银以支持频繁的战争和日益庞大的官僚机构的费用。这样就要力求维持贸易顺差，并尽量攫取为母国生产所需原料的殖民地。”<sup>④</sup>然而，伊比利亚国家和英国的重商主义理论和实践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在美洲各殖民地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经济开发方式、征税制度的实施、贸易的自由程度以及政治的自主程度。实际上，这些也是决定美洲各殖民地的独特性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有必要加以深入的研究。

### 不同的经济开发方式

在不同的精神和物质因素作用下，拉丁美洲和盎格鲁美洲形成了差别极大的两种经济开发方式：前者在奴役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